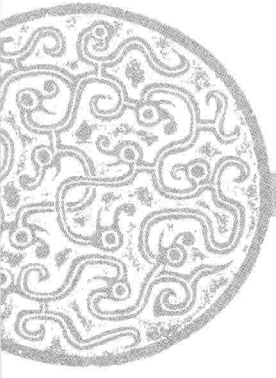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

郭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



郭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郭丹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325-7413-1

Ⅰ.①先… Ⅱ.①郭… Ⅲ.①史传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②史传文学—文学史研究—中国—汉代 Ⅳ.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1643 号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
郭 丹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颛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325-7413-1
Ⅰ·2864 定价：3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到它有若干个文学主流在产生和发展，也有若干个专题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诸如诗歌、辞赋、散文、骈文、词、散曲、戏剧、小说等等。如果把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比作一条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长河，史传文学就是这条长河中的一股劲流。它可以作为一个专题独立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样式，关于史传文学，似有必要给予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史传”二字，《后汉书·隗嚣传》所载《讨王莽檄》中有“援引史传”的话；东晋袁宏在《后汉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①]到了刘勰作《文心雕龙》，特设《史传》篇，专论“史传”。《史传》篇释“传”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刘勰认为，所谓“传”，以声训来解释，就是“转”，即转达，指像《左传》那样，把“经”的意旨转达出来，以传授给后人。因此刘勰把释“经”的文字叫做“传”。[②]《左传》是解释《春秋》经的。《春秋》是“经”，也是史书；《左传》是传，也是史书，《左传》用了很

---

①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86页。

② “传”可解为训诂，《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注：“读谓经，传谓训诂。”又指解释经义，《汉书·古今人表》“传曰”颜师古注：“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多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经,“原始要终”,使《春秋》的记载更加清楚,所以是“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①] 这样,史和传就联系起来了,可称之为“史传”。《史传》篇还论述了其他众多的历史著作,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非解经之作。可以说,刘勰所谓“史传”,包括上起虞夏、下至东晋的各体史书。史传文学中“史传”二字的含意,就是这样的概念。从先秦到六朝,有一批历史著作,它们不仅是其中的某一篇章,或是某一段落具有文学色彩,而且是整部著作都堪称文学杰作,它们做到了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有机统一,它们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所以,我们借用刘勰“史传”的概念和界限,将这样的一批历史著作称为“史传文学”。

此前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对于上起先秦,下迄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一大批文学性很强的历史著作,诸如《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或称之为历史散文,或称之为传记文学,或称之为史传散文,概念颇不统一。当然,就研究的不同角度来说,存在差异也是允许的。然而就文学史的性质来说,概念上的纷杂必然带来作品归类上的困难。称为历史散文,似嫌过于宽泛,其外延并不仅仅涵盖上述作品;称为史传散文,似又不够精当,未能突出上述作品的个性特征;称为传记文学,它也必然碰上一些纠缠不清的麻烦。《中国大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说:“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笔者认为这样来解释传记文学的后半部分是合适的。因为魏晋以后,整部历史著作皆具有很强文学性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杂传、散传以及单篇个人传记作品,这些谓之传记文学或杂传文学当然可以。但是,前面的史传文学,论者往往囿于人物传记的界限而只从《史记》算起,

① 汉人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所以称“春秋左氏传”。古今都有学者认为《左传》非解释《春秋》,虽如此,《左传》与《春秋》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那么，他们便碰上一道难题，无法将《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些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学杰作归入其中，于是或称之为“传记文学的萌芽”，或称之为“历史著作”，使人终觉得不通或纠缠不清。所以，我们将史传文学与传记文学分离，专门用“史传文学”这一名称来界定从先秦到魏晋的这些史传作品，或许更能显现它们各自的特色。

史传文学的根本特征在于文学与史学的融合为一。文学、史学、哲学不分，这是我国上古史官文化的一个特有现象。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分文学与非文学，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刘知幾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史通·核才》）先秦时期，文学尚没有从整体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文、史、哲三者交融为一体，以文学写哲学，以文学写历史，常见于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就史传文学而言，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展现了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变化的动因；它是历史著作，文学不过是其手法。从文学的角度而论，史书只是载体，它以史的形式包容了人类社会的众生万象，是人类社会全部生活的缩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要而言之，它是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

史传文学的载体既然是史书，它当然具备历史著作的本体特征。大凡历史著作所应有的本体意识，如以史为镜的功能，惩恶劝善的职能，讲求实录的原则，以至史家所必需的德、才、学、识，在史传文学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地体现。就我们视野所及的史传文学作品来说，以史学的地位而论，它们大多是杰出的历史著作，有的甚至是伟大的历史著作，比之于后代的史书，它们不但毫不逊色，有的甚至是后代史书无法比肩的楷模。这一点，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样式所不具备的。

史传文学的另一个特征，即它同时又是文学。它不是简单枯燥地排比历史史实，或机械地阐述历史变化规律，而是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解释和演绎历史。它极少作令人乏味的说教，而是将历史

认识融通于人物的言行之中,将历史运动过程转变成情节复杂的历史故事,将历史文学化、故事化。不论是先秦时期还是汉代的史传文学作品,都将历史人物描绘成可视、可感、可爱、可憎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有的人物性格相当鲜明,有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意义。而复杂纷纭的历史事件,又常被组织成曲折跌宕、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有时还增加了许多兴味盎然的细节描写、心理情态刻画。文学的特质在于形象,叙事文学的基本构成在于情节,史传文学的上述特征无疑使其成为品位极高的文学作品。不但如此,在以形象和情节解绎历史的过程中,作者还表达出自己的评价,注入个人的感情;在精神上,它们"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李长之语),所以它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与此同时,史传文学还为叙事文学确立了楷模,《左传》文章的叙事手法,《史记》中的写人艺术,千百年后仍然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奉为圭臬。

有人叹息中国古代没有史诗,没有长篇叙事文学作品,其实不然。史传文学作品就是伟大的史诗,就是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文学。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高潮迭起、杰作频出,在史学与文学双重领域中形成了澎湃的热流。

史传文学是从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大背景中产生的,应该以文化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才能使史传文学的研究获得深厚的文化背景依托。本书的上编"本体论",将从史官文化的大背景入手,探索史传文学赖以生成的文化机制,并阐述文化生成机制对史传文学的制约。史传文学的载体是史籍,它首先具有史学的本体特征。这些本体特征,不但构成了这一阶段史传文学的特质,也是绵延几千年中国古代史学的精髓。对其史学本质的体认,也有助于弄清我国古代文与史关系的内在脉络,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质。史传文学又是文学,但它不同于诗、词、歌、赋等文学样式,它是以史为内容的叙事文学,在文学特质方面又有自身的表征与发展规律。史传文学不是孤立的,它与相近的文学样式是互相渗透与影响的。所以,本书的上编,着重从宏观的

角度对史传文学的总体特征、内部规律进行描述，确认它在文学、文化学中的审美价值，揭示它的整体风貌。

史传文学的发生、发展、高潮、衰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本书的下编，则试图在对史传文学基本特征全面把握的前提下，就其动态发展作纵向的透视。或许有人认为，像《尚书》、《春秋》，似还不能算为史传文学，这种看法似可讨论。不管怎么说，作为史传文学的发轫作品，我们不能将它们排斥在外。史传文学发展的两次高潮，一是《左传》，一是《史记》，尽管它们有各自的特色，后者对前者又有继承关系，但是它们作为史传文学的两座高峰，是毫无疑义的。而一些文学性较差或发生变形的史著，也同样是史传文学的产物，把它们纳入我们的视野，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史传文学的演变过程。下编以对具体作品的微观分析为主，特别注重在具体创作现象上的审美把握与直觉品味，以具体的艺术精神，展示史传文学的丰富内涵与艺术魅力。

本书试图描述的是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其下限包括《三国志》与《后汉书》。有感于以往文学史的传统写法，本书摈弃了以往的单纯依时间序列就作品以次论析的习惯，以“本体论”和“流变论”的双向结构，在史学的本体特征与文学本质特征双向观照的二元组合中，对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发展史进行总结。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作者对大文学史的一点思考。

目　　录

前言…… 1

上编　本体论

第一章　文化背景与生成机制…… 3

第一节　史官文化之背景与机制…… 3

第二节　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 12

第二章　史学本体意识的形成与强化 …… 22

第一节　资治与借古鉴今 …… 22

第二节　劝惩的精神 …… 31

第三节　实录的原则 …… 39

第四节　经世致用与现实精神 …… 46

第五节　史书论赞的文学机制 …… 50

第三章　形式的萌生与成熟 …… 62

第一节　从言事分纪到言事相兼 …… 62
第二节　多种史学体裁的探索 …… 69
第三节　形式的成熟 …… 74
第四节　史传文学中的文体萌芽 …… 79

第四章　文学化的历史叙事 …… 88
第一节　人学：文学与史学的共性 …… 88
第二节　形象与情节解绎的历史 …… 95
第三节　文学化的叙事模式 …… 103
第四节　“众善兼美”的表现手法 …… 111
第五节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 126

第五章　史学中的美学与批评 …… 135
第一节　结构之美 …… 135
第二节　叙事之美 …… 140
第三节　善恶与爱奇：人物形象的审美选择 …… 152
第四节　史传文学的理论总结 …… 158

第六章　横向的渗透与影响 …… 165
第一节　史传文学与神话传说 …… 165
第二节　史传文学与先秦诸子 …… 175
第三节　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 …… 184

下编　流变论

第一章　史传文学之发轫 …… 195
第一节　左史记言，言为《尚书》 …… 195
第二节　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 199

第二章　宏大历史叙事的开创者——《左传》 …… 204
第一节　《左传》的诞生 …… 205
第二节　民本思想，崇礼与崇霸 …… 208
第三节　《左传》的人物形象 …… 213
第四节　《左传》的叙事写人与语言艺术 …… 218
第五节　《左传》的战争描写 …… 223

第三章　《国语》与《战国策》 …… 235
第一节　“深闳杰异”的《国语》 …… 235
第二节　“敷张扬厉”的《战国策》 …… 243

第四章　小说化的《穆天子传》与《晏子春秋》 …… 255
第一节　《穆天子传》 …… 255
第二节　《晏子春秋》 …… 263

第五章　史传文学的高峰——《史记》 …… 27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伟大的人格…… 275
第二节　宝贵的思想财富…… 281
第三节　宏伟的历史人物画卷…… 289
第四节　“无韵之《离骚》” …… 296
第五节　写人艺术的新成就…… 301

第六章　史传文学的变异…… 309
第一节　《新序》、《说苑》、《列女传》 …… 309
第二节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 317

第七章　史传文学的转型与回落…… 324
第一节　班固的《汉书》 …… 325
第二节　向纯史学迈进…… 337
第三节　史传文学的转型…… 345

参考书目…… 348
后记…… 356

上编　本体论

第一章　文化背景与生成机制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远古的蛮荒时代到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巫官文化时期。在原始社会，人们崇拜和信仰神灵，祈求于神灵，把理想和追求都寄托于神灵身上，由此产生了原始巫术，形成了巫官文化。我们从现存的原始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以及原始绘画、歌谣、舞蹈等原始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上，无不可以发现巫官文化的特征。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民族文化的长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产生了以人伦本位为特征的史官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中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劲流——史传文学，便是萌生与成熟于史官文化的背景之中。

第一节　史官文化之背景与机制

一、史官文化的形成

史官文化的形成，与史官的设置有密切的关系。传说史官设于黄帝时期。而“史”字的本意，据《说文解字》云：

>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意谓“史”为记事的人,即为史官。“从又持中”,是右手持“中”的人。“中”是什么呢?章炳麟解释说:“中,本册之类。”(《章氏丛书·文史》)“中”指简册。所以“史”也就是掌管典册的人,亦即掌史之官。有的学者从巫史文化的关系上来解释“史”的原意,认为“从又持中”这个“中”是氏族社会的中族之“中”,即氏族部落的中旗,后来引申为史册。《吕氏春秋·谕大》篇有“舜欲旗古今而不成”的记载。“旗古今”是把古今事件写在中旗上,而中旗是每个氏族的图腾与标志,将氏族最早的历史写在中旗或图腾柱上,这就是“史”的职责。[①] 在巫官文化时代,主持占卜的巫师是贞人,同时也是通晓文字、天文历法、掌管文书的史官。原始巫官本具备“史”的职能。正因为如此,后人常将巫史并称。而史官设立之初,也难免仍担负着原始巫官的一部分职能。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云:

>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管”一作“度”)

说明最早的史官之职,与巫祝相近,除掌史之外,又兼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职责,可谓天人之间,诸事皆管。这正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还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明证。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司马迁对其先人的自述中得到证明:“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巫、史之间的职能演变,显示出巫官文化为史官文化所替代的过程。不过文化形态的转型与嬗变并非是突发性的,而是一个承继发展

① 参见宋兆麟《巫与巫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的过程，就是在史官文化形成之后，巫官文化也没有悄然消失殆尽，它仍然残存在许多领域之中。早期史官文化的职责，体现了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过渡的形态以及巫官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史官之设，为时极早。按照东汉许慎所说“黄帝之史仓颉”（《说文解字》），与刘知幾所说“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史通·史官建置》），则黄帝时代已有史官。传说黄帝之史官名曰沮诵、仓颉，其二人，“始作书契，以代结绳”（《晋书·卫恒传》）。然而从文字起源的历史来看，这种说法未必可信。《吕氏春秋·先知》篇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这位太史令终古，即夏桀时期的史官。夏朝开始已有史官，这大概是确定无疑的。殷朝时期的史官，根据甲骨文中所记，称为“作册”、“史”、“尹”等。到了西周，史官之制已相当齐备。《史通·史官建置》云：“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职责也非常明确，分工且细：“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但周王朝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置了史官。《左转·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说：“且昔而高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据杜预注，辛有是周平王时代的人，其次子董史，即后来晋国著名的史官董狐。所以晋国的史官有籍氏与董氏，其历史已相当久远。晋国之外其余各国的史官，设置也相当的齐备。《左传》里面除了著名的董狐、南史之外，以史为名的如史墨、史猷等史官就有几十人。《左传》记载这些史官的应对问答之辞，更是俯拾皆是。

古代史官的地位并不高，但其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古者“君举必书”，史官成为天子或国君身边须臾不可或缺的人物。《史记·晋世家》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